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叶 隽 著

德语文学研究 与现代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学 | 术 | 史 | 丛 | 书

叶 隽 著

德语文学研究 与现代中国



北京大学出版社
PEK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叶隽著.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8. 9
(学术史丛书)

ISBN 978-7-301-14261-5

I. 德… II. 叶… III. 德语—文学研究—中国 IV. I10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143261 号

书 名: 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

著作责任者: 叶 隽 著

责任编辑: 艾 英

封面设计: 林胜利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14261-5/I · 2064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 205 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电子邮箱: pkuwsz@yahoo.com.cn

电 话: 邮购部 62752015 发行部 62750672 出版部 62754962

编辑部 62752022

印 刷 者: 北京汇林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650mm × 980mm 16 开本 32.25 印张 556 千字

2008 年 9 月第 1 版 2008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50.00 元

未经许可,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10-62752024; 电子邮箱: ld@pup.pku.edu.cn

《学术史丛书》总序

陈平原

所谓学术史研究,说简单点,不外“辨章学术,考镜源流”。通过评判高下、辨别良莠、叙述师承、剖析潮流,让后学了解一代学术发展的脉络与走向,鼓励和引导其尽快进入某一学术传统,免去许多暗中摸索的工夫——此乃学术史的基本功用。至于压在纸背的“补偏救弊”、“推陈出新”等良苦用心,反倒不必刻意强调。因为,当你努力体贴、描述和评判某一学术进程时,已有意无意地凸显了自家的文化理想及学术追求。

其实,此举并非今人的独创。起码黄宗羲的《明儒学案》、江藩的《国朝汉学师承记》已着先鞭,更不要说梁启超、钱穆各自独立完成的《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至于国外,同类著述也并不少见,单以近年译成中文的为例,便有古奇的《十九世纪历史学与历史学家》、丹尼尔的《考古学一百五十年》、尼古拉耶夫等的《俄国文艺学史》、勒高夫等的《新史学》,以及柯文的《在中国发现历史》等。

即使如此,90年代中国学人之热中于谈论“学术史”,依然大有深意。一如黄宗羲之谈“明儒”、梁启超之谈“清学”,今日之大谈学术史,也是基于继往开来的自我定位。意识到学术嬗变的契机,希望借“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来获得方向感,并解决自身的困惑,这一研究策略,使得首先进入视野的,必定是与之血肉相连的“二十世纪中国学术”。

当初梁启超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只是其拟想中的《中国学术史》之第五种；今人之谈论“学术史”，自然也不会以“二十世纪”自限。本丛书不要求打通古今，更希望兼及中外——当然，这指的是丛书范围，而不是著述体例。

无论是追溯学科之形成，分析理论框架之建构，还是评价具体的名家名著、学派体系，都无法脱离其所处时代的思想文化潮流。在这个意义上，学术史与思想史、文化史确实颇多牵连。不只是外部环境的共同制约，更有内在理路的相互交织。想像学术史研究可以关起门来，“就学问谈学问”，既不现实，也不可取。

正因如此，本丛书不问“家法”迥异、“门户”对立，也淡漠“学科”的边界与“方法”的分歧，只要是眼界开阔且论证严密的学术以及思想史、文化史方面的著述，均可入选。也许，话应该倒过来说：欢迎有志于通过触摸历史、感受传统、反省学科进而重建中国学术的学人，加盟此项说大不大、说小不小的“文化工程”。

1998年8月4日

序：不只是一部学科史……

杨武能

这是一部追本溯源、钩沉索隐的学科史著作。研究对象，诚如书名所示，主要为德国文学研究在现代中国发端、演进和发展的历史。当今中国，外国文学研究整个已处于学术的边缘，其中很不显眼的德国文学研究，自冯至先生辞世以来更沦为了边缘的边缘，因此备受忽视、冷落，愿意涉足的人日益稀少。在这种情势下，投身这一冷门学科的学科史研究，多么需要甘于寂寞和不畏辛劳的勇气和牺牲精神啊。单单这一点，就令我对作者叶隽博士心怀敬意，就令我不能不对他这本书的出版鼓掌叫好。

笔者孤陋寡闻，不知我国外国文学研究领域是否已经有过类似的学科史著作，但却可以肯定，在中国德语文学范畴它是破天荒的第一部。毫无疑问，这又增加了这部书的意义和价值。前几年出版的拙著《三叶集》有篇序言《小草狂语》，曾不无自豪地提到不才在“山中无老虎，猴子称霸王”态势下搞到的几个第一，但在最后却解释说：“如此明目张胆地以自傲示人，显然很不君子，明眼慧心的学友和读者不会不明白我的用意，我的苦心：不过是为了激励，或者说挑战同行中的有心人特别是后起之秀，让他们来赶超不才，把我们这本来不起眼的事情搞得多一点声色，对社会多起一些作用也多受一份重视罢了。”叶隽博士正是我所期待的有心人和后起之秀，他的著作赶超了我近二十年前敷衍成书的《歌德与中国》，创造了一个比我更有分量

和价值的。我充分体验到这分量和价值并予以高度的评价,是因为自己也曾有意写这样一本书,然则深感力不从心,终于知难而退。也由于此,我为他这个第一感到骄傲和高兴,高兴中国德语文学——其实确切地讲不只是德语文学——的研究后继有人。

显而易见,我这里所说的力,既指精力、毅力,更指学养、学力。叶隽博士不仅正值盛年,学术背景也令人羡慕。这两个并非人人都有的优越条件,又使他的著作具有了更具实质意义的特点和优点,那就是既富学术性也不乏新意。新意体现在他使用了种种前辈学者不曾用过研究模式和方法,这一点稍加比较即可看出,毋庸赘述;对其富有学术性这个优点,则不妨多说两句。笔者不揣浅陋地归纳出几条,就教于作者、读者和同行专家。

这是一部学科史,作者以题名如此定义,但事实上又不只是一部学科史。因为本书的一大特点或优点,在于它并不局限于史料的罗列、堆砌,以致变成一本枯燥乏味的资料集抑或编年史,而是立意深远开阔,拿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要将学科史梳理与学术史研究结合在一起,以求在相当程度上折射出中国的“外国学”所共有的研究进程、曲折经历,且不以此为限,还“尝试整合学术史、教育史、社会史与文化史的融通视野,借鉴各领域的研究方法,努力呈现较为完整的现代中国语境内的德语文学学科史的景观”。所以,这部著作就不仅富有学科史甚或学术史价值,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出了现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和文化的发展历程,具有了一定的文化思想史和德中文化交流史意义。

这部著作的另一可贵之处是强烈的问题意识。既为史学著作,就难免史实的搜集、考订、陈述,但作者不只善于抓住和突出重点,避免平铺直叙、平淡无奇,而且以现代中国的一些重要机构、人物和事件,建构本书的看点或骨肉,进而再围绕着它们提出一个个富有启发性和学术意义的问题。这便赋予了骨肉以精神,使原本枯燥的史料和故人、旧事有了现实意义和鲜活生命,让人读来不觉得乏味、隔膜,而是相当地有趣和亲切。具体讲,作者精心设计的章节标题,就凸现了他可贵的问题意识。

不能不说说史料的丰富、翔实,因为这是一部史学著作的价值基础。作者具有做实证、考辨的深厚功底,也勤于在这方面花时间、下工夫。在学风十分浮躁的今日,这应该说难能可贵。记得他常常为了一些“细枝末节”,不厌其烦、不远万里地驰书向我求证,时常令我穷于应对。须知,本人的主

要志趣在德语文学译介，研究乃不得已而为之，对他擅长的这类研究只在早年玩过一段时间的票。可尽管如此，对包括叶隽博士在内的实实在在做研究的年轻学友，我不但怀有厚望，也真是心存敬意。

至于学术著作本应具备的诸如系统、全面、深刻、结构谨严、逻辑性强等优点，就不必赘述了。总之，这是一部作者用心良苦、富有学术价值、值得我们重视的好书、力作。

年轻的叶隽博士之所以能取得这样的成绩，之所以眼界开阔、学养深厚，除了他是一个有心人并作了长期的努力，追本溯源，还得益于他曾就读于国内一系列重点学府，并有机会在国内外一些权威学术机构从事研究工作，有幸得到一位又一位名师的教诲。正是这些优越的、令我辈艳羡的条件，成全他完成了这样一部书。

当然，尽管优点多而突出，却也不可能没有值得商榷、探讨的问题。我个人感觉，最突出的问题恐怕出在“正名”两个字。作者把书的内容大致框限为“德语文学研究与现代中国”，然则“德语文学研究”这顶帽子太小、太局促，罩不住底下生长出来的巨大脑袋和躯体。原因就在通常译作日耳曼学或德国学的 *Germanistik* 这一学科称谓，被以偏概全地译成了“德国文学研究”甚至只是“德语文学”，以致有的地方出现了以“中国的德国文学”替代内涵丰富得多的“中国的日耳曼学”的情况。以叶隽博士的好学深思，不会不明白根本不存在“中国的德国文学”，也就是不存在用德语在中国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只有中国的日耳曼学抑或中国的德国研究。为什么把 *Germanistik* 简单地等同于德语文学研究甚或德语文学有失偏颇，我想无须多作解释。更有甚者，书中还将中国的国学和所谓外国学相提并论、对照使用，似乎也欠考虑。因为国学一词素有特定含义，不等于一般说的汉学或中国学。洋洋四十万言的著作有所疏忽，留下二三问题，算不了什么。正是因为留下了问题，就存在进一步思考和探索的余地。

在这个意义上，我期待着叶隽博士下一部更精彩的大作问世。

2008年7月16日于德国缪尔斯

目 录

《学术史丛书》总序/陈平原/1

序：不只是一部学科史……/杨武能/1

导 言 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1

第一章 传统思路的“德国探究”/12

第一节 德语教学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从官方到民间/12

第二节 德国教育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以同济医工、青岛高专的办学实践为例/29

第三节 德国研究在近代中国的兴起

——以改良派为中心/47

第四节 近代中国对德语文学的期待

——从歌德之介绍到学科之雏形/66

第二章 现代大学制度的建立与德语文学学科的形成

——以北大德文系为中心/88

第一节 北大德国文学系的创立情况及其时代背景/89

第二节 北大德文系 1920 年代前后的课程、图书与
教学/101

第三节 北大德文系早期的师生状况及其学术史意义/123

第三章 从“学生一代”到“先生一代”：清华与西南联大的
德文教授/146

第一节 清华德文专业的早期发展及其学术史意义/147

第二节 由学生到先生：陈铨在清华的经历与选择/168

第三节 西南联大时代的德语教育与德文教授/186

第四章 南北大学与德风东渐:1940 年代德文专业的 变迁/201

第一节 德风东渐的背景与德文专业的枢纽地位/201

第二节 北大、清华、中大德文专业的兴替/209

第三节 作为机构的德文系:教育史、学术史与文化史
视角的考察/235

第五章 德国文学史的编撰与思路歧异

——以《德国文学概论》为中心/246

第一节 现代中国对“德国文学史”的期待视野/247

第二节 刘大杰的学术训练与文学史观/268

第三节 德国文学史撰作的方法、意义与思路/290

第六章 歌德研究的思路、方法和意义

——以冯至的《歌德论述》为中心/310

第一节 歌德译介与研究的时代背景及《歌德论述》的
意义/311

第二节 冯至的歌德观及其个案研究的学术史意义/325

第三节 中国歌德研究的新起点/346

第七章 中德比较文学研究及其学术史位置

——以陈铨的《中德文学研究》为中心/359

第一节 现代中国的比较文学研究背景及中德比较
文学的位置/360

第二节 陈铨的比较文学观

——以《中德文学研究》为中心/371

第三节 中德比较文学研究的学术推进与时代维度/386

第八章 机构建制、学风流变与方法选择:现代中国语境 里的德语文学研究/397

第一节 “先生一代”与“学生一代”:先行者的“奠基工
程”与后来者的“传承意识”/398

第二节 “国学”与“外国学”

——以傅斯年与冯至的比较为中心/415

第三节 “方法选择”与“自身困境”

——从“学术伦理学”、“学术社会学”双重视角对
冯至、陈铨进行分析/435

主要参考文献/451

西文—中文名词对照表·索引/476

中文名词索引/487

表格目录/499

后 记/501

导 言

学科史构建与学术史进程

一、“辨章学术”与“西学东渐” 视野中的“德语文学研究”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国内学界的学术史研究蔚为潮流,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既反映了学人承继学统的自觉意识,也表现出当代中国市场大潮背景下学院知识人寻求精神突围的一种选择可能。^①

中国现代学术的开端一般认为是在 19、20 世纪之交,刘梦溪为大型丛书《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撰《总序》,总结其标志为:在学术目的上承认学术具有独立之价值;在方法论上开始吸收西方现代的观念和研究方法。举代表人物严复、梁启超、王国维,以他们的四篇文章作为标志,即 1898 年严复的《论治学治事宜分两途》、1902 年梁启超的《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和

^① 关于学术史研究的发凡起例,可参见《学人》第 1 辑上集中刊载的一组“学术史研究笔谈”,载《学人》第 1 辑,第 1—48 页,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1 年。

《新史学》、1904年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强调在这几篇文章中，现代学术思想和学术规范得到比较集中的体现，故可认为是中国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过渡的标志。^① 这一论述，在宏观上把握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具有高屋建瓴的气势。麻天祥等更撰著《近代中国学术史》，系统梳理1840—1949年的中国学术历程，将近代学术归纳为两大特征——“变”与“合”，总结为三大内容——如何评价传统、怎样引介西方、建设什么样的未来文化；并综述近代学术的新格局为：以传统固其根本，用国粹激动种姓；以西学发展生产，改良政治，解放思想；以佛理补理性思维之不足；子学复兴扩大了学术领域；近代社会名教奇变，在学术上要求求真与致用为一体。^② 这样的题目选择，决定了其注重历史发展的轨迹，所以在具体问题上往往颇难深入。

如此泛泛而论学术，固然是继承了中国传统学术中的“通人”思路，但对因由“西学东渐”与“现代民族—国家”建立而导致的重大社会变化似乎体贴不够。故此，陈平原论“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这样的大题目，则选择“以小见大”的策略，只是通过章太炎、胡适之这两个代表性个案入手，强调是晚清、五四两代学人的“共谋”促成了中国现代学术的转型，所谓“从‘进士’到‘留学生’”，暗藏学术由“通人”向“专家”转变的思路，其实也已充分意识到“专家”之变，乃是“西学东渐”的必然产物。虽然作者希望表达的是，“中国现代学术的建立，并不只是‘西学东渐’的顺利展开”^③，但若非西学东渐之势力过于强大，也实在没有必要如此立论。

《20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书系的推出，则不再通论学术，而是分门别类，试图在人文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各出四卷，是为文学、史学、哲学、艺术，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法学，足见主事者的学术眼光与推进思路，已经意识到需要落实在具体学科层面上，进一步深化关于学术与社会问题的探讨。虽然

① 《学术独立与中国现代学术传统》，见刘梦溪：《传统的误读》第78页，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

② 麻天祥等：《近代中国学术史》，第8页，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关于中国传统学术，也有学者进行了历史梳理，参见卢钟锋：《中国传统学术史》，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8年。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3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因故未能如愿,但已成书的五卷,通论文学、史学、哲学、法学与社会学,其入手处仍是比较宏观的层面。在“文学卷”中,作者显然试图以问题为中心,探讨“现代文学的发生与形成”、“现代文学的现代处境”等题目,目的是“通过两个互相联系的线索叙述了中国现代文学观形成和发展的历史:一方面是它与现代知识的关系,一方面是它的现实处境及其与现实处境的关系”^①,对学科研究情况少有论及,更不用说外国文学了。倒是其中的“史学卷”,在学术思路上提供了更多可借鉴之处,在注重“史学思想变迁”之外,还关注“历史研究的主题、写作和表述方式、所传授的历史知识(如历史课本)、与史学相关的学术建制(institutions)以及社会对史学的认知等方面的变化”^②。

近期学术史研究中值得注意的成果是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作者自陈其目的“在梳理近代中国史学在西方学术的冲击下怎样确立自身的学科定位,特别注重其与西潮进入之前的中国学术传统的关系,以及这一过程中形成的一些(而非全部)有特色研究取向和方法”,主要探讨“学术的思想和社会语境与学术发展的关系”。^③其他著作取径不同,但思路则一,都是以明确的问题意识贯穿学术史研究,陈以爱的《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从具体学术机构的兴衰变迁入手,对学术发展的诸种重要因素详加剖析,包括诸如学术组织化、同人治学旨趣及其研究趋向形成的原因、学术平等观念的出现、学术体系的瓦解与重组等^④;尚小明的《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则试图将政治史、社会史与学术史、文化史研究相结合,为探讨有清一代之学术文

① 韩毓海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文学卷》,第 3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罗志田主编:《20 世纪的中国:学术与社会·史学卷》上册,第 5 页,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③ 但我们不应忽略,作者原是有内外两篇的构思,本书只是外篇内容,内篇则试图“沿学术发展的内在理路论证取向、方法、史料观等”具体问题。罗志田:《国家与学术:清季民初关于“国学”的思想论争》,第 13 页,北京:三联书店,2003 年。

④ 陈以爱:《中国现代学术机构的兴起——以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为中心的探讨》,南昌:江西教育出版社,2002 年。

化提供崭新视角^①。

综上所述,从宏观泛论中国现代学术(有学者也用“近代学术”的概念)^②,到从具体的问题意识层面衍生著作,其涉及范围则涵盖了学术之内部与外部的关系、学术机构的个案研究、学人的个案研究、学术史现象等,可谓“荦荦为之大观”。但在我看来,中国现代学术最重要的背景有二,一是“西学东渐”之展开,二是“学术体制”之建立。其中尤以现代大学制度的构建至关重要,不可不察。因为,“对于现代中国学术而言,大学制度的建立至关重要”^③,而“将中国学术由贩卖导入研究之途的,首推蔡元培”^④。恰恰是蔡元培,在北大一力推动外国文学的分系发展,建立了德国文学系,中国的德语文学学科由此而得以奠立。所以,现代大学体制、研究机构建制与具体学科形成有莫大关系,值得细加考察。而迄今为止,研究者主要关注的仍是“国学”(这里泛指以中国研究为对象的学术),其实,在“西学东渐”的大背景下,“外国学”(这里指与前指“国学”相对的概念,即以外国研究为对象的学术)也同样值得细加探究。因为,与“国学”不同的是,它们在中国没有渊源,完全可以说是“舶来之物”,因而其如何在“现代中国”语境之中落地生花,更是对加深“西学东渐”及如何吸收“外国资源”之认识的重要标本。即便如此,我在这里也并不意味着泛泛而论“外国学”,甚至也不想谈论

① 尚小明:《学人游幕与清代学术》,第11页,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此外尚可一提的著作,诸如刘大椿:《新学苦旅——科学·社会·文化的大撞击》,南昌:江西高校出版社,1995年;王先明:《近代新学——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的嬗变与重构》,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年;桑兵:《晚清民国的国学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关于中外学术之间的关系史即比较思考,可参见方朝晖:《“中学”与“西学”——重新解读现代中国学术史》,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2年;桑兵:《国学与汉学——近代中外学界交往录》,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99年。

② 有论者就专门“重点考察晚清时期学术分科及近代学术门类创建问题,进而阐述传统知识系统在近代转轨及近代知识系统之初步建立”问题,参见左玉河:《从四部之学到七科之学——学术分科与近代中国知识系统之创建》,第7页,上海:上海书店,2004年。但作者强调这只是“第一步工作”,还“需要从学术形态转变之其他方面,如研究主体、对象、方法、内外机制等方面进一步拓展和深入,藉以将近代中国学术思想演变的历程勾画出来”,将成书《从通人之学到专门之学——近代中国学术转型问题研究》,见上引书,第467页。

③ 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第18页。

④ 王奇生:《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第294页,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2年。

具体的国别如“德国学”，而是选择外国学中的某一具体学科，深入下去，探讨作为“德语文学”的这一相对较小规模的学科史的形成过程。

这是因为，学术史研究这十余年来不但成为热潮，而且其代表性研究者的眼界、思路、层次确实亦已上升到较高层面；若想“更上层楼”，必须要进入具体的学科史层面，一方面在具体的史实挖掘层次更出“新材料”，另一方面也要在保持现有水平的问题意识的同时“别出新意”。若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有“自知之明”。虽然同为学术中人，甚至具有跨学科的背景，但“尺有所长、寸有所短”，各家只有在立定自身专业背景的情况下，才可能略涉“打通”与“融会”。所以对于我而言，选择既是自己专业、又确实未得到学术史研究者重视的“德语文学学科史”为研究对象，其实是希望提供“考镜源流”的“另一只眼”。此著的基本立意，乃是兼及学科史研究与学术史研究。因为，学术史研究既是一项著述计划，也是一种自我训练；对我，则此项工作不仅是一种尝试性的研究，更是通过“亲手触摸”以求对学术史有一个感性的认识，而对“学科史”的梳理，更是为了承继传统、选择方向，以求能在未来的研究中站在“前贤的肩膀上”，步步推进。

二、中国“德语文学学科史”研究现状

对于中国的德语文学研究史，尚无学者做过系统的研究。似乎较之国内学者而言，德国学者对我们的研究状况更感兴趣。Harnisch, Thomas 著 *Chinesische Studenten in Deutschland-Geschichte und Wirkung ihrer Studienaufenthalte in den Jahren von 1860 bis 1945* (《中国留德学生——1860至1945年间留学的历史和影响》)，专门列出一小节叙述留德学生与中国的德语文学。^① Hernig, Marcus 著 *China und die interkulturelle Germanistik; Kulturvergleich, Interkulturalität und Interdisziplinarität im Rahmen der chinesischen “Wissenschaft vom Deutschen”; Einzelfallstudie zur Situation und*

^① Hamburg: Mitteilungen des Instituts für Asienkunde, 1999, S. 465-471.

Entwicklung der chinesischen Germanistik (《中国与跨文化德语文学:中国“德国学”框架中的文化比较、跨文化与跨学科——对中国德语文学现状和发展的研究》),同样对中国的德语文学和德语教学情况进行了综述^①,但相当简略,且重心在当代情况。

中文的文献至今未见,但却看到不少中国学者在德国刊物上发表的有关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情况,很可能是应德方之约而撰作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包括:Zhang Yushu(张玉书):“Die Germanistik in China-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德语文学研究在中国——过去和现在》)^②,Zhu Yan(祝彦):“Vergangenheit und Gegenwart der Germanistik in China”(《中国德语文学研究的过去和现在》)^③,Han Wanheng(韩万衡):“Deutschunterricht und Germanistik in China”(《中国的德语教学与德语文学研究》)^④和 Ni Jenfu(倪仁福):“Germanistik in der VR China”(《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德语文学》)^⑤。但在具体史实的叙述上,则歧义颇多,有待细加考证。

此外值得关注的,是对德语文学学术著作的研究。其实,具有经典意义的文学史著作应当被充分重视,但在德语文学研究界似乎更多的注意力被放到了读德国学者的著作上,国人的研究反而被放置一旁。这自然可以理解,毕竟研究的是“德语文学”,对象国的研究应当得到充分关注。但既是在中国语境里研究“德语文学”,国人的经典著作也同样不可逾越。就这个意义而言,俞仪方的工作有“重新发掘经典”的功用,她先后评述了张威廉(张传普)的《德国文学史大纲》、刘大杰的《德国文学概论》^⑥,对我们重新认识德语文学研究史的筚路蓝缕是有价值的。

对具体学者的研究,也同样处于浅尝辄止的状态。对张威廉的研究,江

① München: Iudicium, 2000, S. 129-137.

② In *Jahrbuch für Internationale Germanistik* 1, 1985, S. 168-184.

③ In *Deutsch als Fremdsprachen* 24, 1987, S. 242-246.

④ In Hans-Joachim Althof. (hrsg.): *Deutschlandstudien international I. Dokumentation des Wolfenbütteler DAAD—Symposiums 1988*, München: Iudicium, 1990, S. 151-166.

⑤ In *IDV—Rundbrief*, Okt. 1995, S. 18-42.

⑥ 张传普:《德国文学史大纲》,上海:中华书局,1926年。